



在书页间

回望抗战汲取奋进力量



■黎余

红岩荒谷耳,抗日显光辉。谈到重庆这座英雄城市的历史,就不得不提及红岩。20世纪30年代,开明进步的饶国模在位于重庆市郊的红岩开办大有农场。1939年,她将红岩的部分土地、房屋提供给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红岩:抗日显光辉——评《中共中央南方局与伟大的抗日战争》

从这时起,红岩不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紧密相连。由此,以红岩为代表,包括曾家岩、虎头岩在内的“红色三岩”,不仅成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党中央领导国统区党的工作的指挥中心,也成为给国统区人民带来光明与希望的一座灯塔。为全方位呈现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贡献,2025年7月,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与伟大的抗日战争》出版发行。该书以翔实的史料充分反映了全民族抗战时期,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同反动势力展开坚决斗争,维护国共合作抗战大局,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形成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巨大贡献的历史。该书出版后,获得较大的社会反

响和好评。其中,在新华社发布的《出版界推出一批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优秀主题图书》报道中,《中共中央南方局与伟大的抗日战争》成为重庆出版界唯一的上榜图书。新华社报道认为,《中共中央南方局与伟大的抗日战争》等一批学术研究类著作坚持正确抗战史观和二战史观,准确把握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主流、本质,坚持思想性与学术性相统一,既坚持原原本本记录历史,饱含深情讴歌英雄,又注重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奋进力量,研究深度和广度都有新突破。读罢全书,我感受到有三个鲜明特点:一是主题突出,主线清晰,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该书紧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这一重大主题,以“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战略策略引领”开头并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旗帜鲜明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在充分学习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站在时代高度以新视角解读旧材料,生动呈现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在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开展抗日政治宣传、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南方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等方面的关键作用。二是史料翔实,权威可信,具有严谨的学术性。史学著述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基础的工作,就是要尽可能地占有史料,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史料、运用史料。该书坚持依据权威文献、运用第一手史料,选编的历史文献和口述回忆主要选自中央有关部门编辑出版的党的重要文献选编、汇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选集、文集等出版物,确保重要史实有出处、重要数据有来源、重大论断有依据。同时,面对数量庞大、类型丰富的史料,编写组秉承“孤证不立、言必有据”的原则,对使用的档案文献、报刊资料、采访

记录等进行缜密筛选、细致考证,坚持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确保史实依据充分,史论严谨可靠,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三是内容丰富,编排新颖,具有生动的可读性。该书围绕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主线脉络,全面系统介绍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在统战、文化、群众、外事、军事、党建等各领域的工作情况,多角度呈现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重大贡献的历史。值得一提的是,在保证史学著作政治严肃性的基础上,该书在选编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同时,选取历史当事人的口述史料,使历史的叙述既严谨、准确,又更加完整、生动,大大增加了书籍的可读性。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营养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应从这段历史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和红岩精神,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务实的行动担当,扛起时代使命、勇担历史重任,不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壮丽篇章。(作者系重庆市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

光影中的不屈之城——评《〈苦干〉与战时重庆——影像史学视野下的战时首都》

首映引起轰动,并荣获第14届奥斯卡纪录片特别奖,成为首部获此殊荣的反映中国抗战的影片。影片真实记录了中国大后方抗战的历史场景,让世界透过影像了解中国抗战的真相。作为“重庆近代城市历史研究丛书”的重要成果,《〈苦干〉与战时重庆——影像史学视野下的战时首都》突破了传统文献史学的叙事局限,开创性地运用影像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考察了《苦干》呈现的战时重庆的多元城市图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外交等多个维度,完成了对重庆抗战历史的全新书写。书中重点剖析了重庆1940年经历的“八一九大轰炸”,以及战时重庆的防空体系建设,还对《苦干》背后的历史及其主创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史料挖掘与研究。这不仅是一部严谨的学术专著,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记忆档案。作者

通过逐帧考证电影画面中的时间、地点、人物、建筑、街道、物件等,对应相关档案文献进行互证研究,还原了一个真实、立体且充满韧性的战时重庆。书中,作者结合《苦干》中的珍贵镜头与丰富的档案文献,细致梳理并展现了重庆城市格局的演变:从城市交通的重新规划到火巷公路的开辟,从城市空袭防御体系的建构到城市建筑的应急改造与重建,乃至城区的扩展与管理系统的建立,无不展现出战时应急体制下城市维持运转的复杂与艰辛。这些内容不仅填补了特殊历史背景下的城市史研究空白,更让我们看到,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重庆的城市肌理虽遭破坏,但内在的生命力与组织力却从未断绝。全书最震撼人心的部分,莫过于对《苦干》记录的日军在1940年8月19日至20日对重庆实施大轰炸的影像研

究。日军出动400架次各型轰炸机,在48小时内分8批次对重庆进行狂炸,尤其针对繁华的商业区和密集的住宅区,这是抗战时期历次重庆大轰炸中规模最大、城市建筑和市政设施毁坏最严重的一次。该书并未停留在宏观的伤亡统计上,而是透过《苦干》的镜头,辅以档案、地图,对日军的机型、炸弹型号、投弹位置及轰炸轮次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图文并茂的详细考证,展现了城市遭轰炸后建筑、人员、基础设施等遭受的损失。这种基于影像的实证研究,不仅揭露了侵略者的残暴,更以无可辩驳的视觉证据,将战争的残酷镌刻进历史记忆深处。书中对重庆抗战时期的城市变迁展开了多元描写,尤其聚焦于防空体系的构建与市民的日常生

活,而是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地前往就近的防空洞躲避轰炸,整座城市依旧井然有序,除了轰炸发生时,其余时间都各司其职。《〈苦干〉与战时重庆——影像史学视野下的战时首都》是国内第一部着眼于影像史学视角研究战时重庆的专著,也是以美国电影纪录片《苦干》为核心史料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拓荒之作。作者并未简单地将影像作为插图,而是将其视为与文字文献同等重要的影像“文本”,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对影像记录的历史信息进行考证和还原。这种“以影证史、以史释影”的研究路径,不仅丰富了抗战史的叙事维度,也为城市史、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它提醒我们,历史不仅写在纸上,也记录在光影中,等待后人去发现、去解读。今年是《苦干》公映85周年,重读此书,书中的影像与文字提醒着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那种在苦难中坚守、在毁灭中重生的“苦干”精神,永远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作者系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文博馆员)

艰苦抗战中的一抹“间色”——《1942,中国北碚:一座小城的抗战与生活》读后

年岁里维持日常生活,又如何以各自的方式坚守民族文化、教育与实业的薪火,以微观的、具体的个人故事,映照一个民族救亡图存的奋斗征途。该书将卢作孚、陶行知、老舍、梁实秋等人物重新放回具体的时代现场,以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和细节描写将读者拉进书世界中。如,老舍的多鼠斋经过修缮,在如今看来已是相当漂亮的小别墅,一楼一底,呈现出中西合璧的风格。而在当年,这座小楼饱受日机轰炸,是一座摇摇欲坠的危楼。老舍说:“多鼠斋的老鼠并不见得比别家的更多,不过不比别处少就是了。前些天,柳条包内,棉袍之上,毛衣之下,又生了一窝。”寥寥几笔带出了居住环境的艰辛。作者还采用“平视”的视角观察历史人物,卸下光环滤镜,再现他们粗粲却有着真实质感的生活。

如,对卢作孚的描述,原可从卢作孚进行乡村建设、教育救国等方面讲起,但是作者却从民生公司1942年股东大会上卢作孚的痛苦哽咽起头,激发读者好奇心,通过倒叙的叙事手法交代来龙去脉:经过悲壮的大撤退后,彼时的民生公司已经出现严重亏损,公司的员工们仍坚守岗位,捐躯赴死,卢作孚不禁眼含热泪,与过往冷静沉着的样子形成反差。战争虽至,但生活没有停摆。作者在书名上给读者留下了耐人寻味的“钩子”——“抗战”与“生活”。“抗战”意味着非常态、意味着高度警戒与危险,而“生活”则把视线拉回普通人的日常,回归到柴米油盐酱醋茶,增添了一丝烟火气。作者写抗战时期的“生活”,实则是在回答:普通人究竟怎样经历战争?这也是“间色”的真正意义,它不

是让战争变得轻盈,而是让战争变得更加真实,映照出生命底色。战争不只是远方的炮火,也是一种渗透进日常的存在。如,书中写道:1939年5月3日,尖利的防空警报划破平静的天空,梁实秋替好友龚业雅扛着皮箱,挽着房东太太仓皇窘迫地躲避轰炸;北碚冬天阴冷潮湿,梁实秋与龚业雅共同探访好友方令儒,围坐一起分食瓦罐中煨好的肥瘦相宜的猪肉;梁实秋接待客人但却没有足够的空房时便打通宵的麻将,直至鸡鸣报晓……反映了个体生活一直在继续,民族的薪火在燃烧,未来还有希望。个体的得意与失意往往与时代背景密不可分,战争从来不是单个领域的事情。有人奔赴战场,有人救治伤员,有人生产物资,有人坚守校园,有人继续写作,有人保存文化火种。不

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情,却共同构成了一个民族抵御危亡的社会肌理,锻造着民族的韧性。如今,八十余载过去,北碚早已不是当初的小乡场,中国也早已走出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但历史之所以需要不断重述,并不是因为过去没有被记录,而是因为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过去。《1942,中国北碚:一座小城的抗战与生活》一书,提供了一种新颖的历史观看方式:从一座小城管窥一个大时代、从具体的人重新认识历史、从日常生活映照生命底色。这种观看方式将“抗战记忆”的宏大叙事,转变成可以被普通人触摸、感受和理解的生活经验。它的价值,不只是打捞了一段被尘封的地方史,更在于让我们看到,在艰苦抗战的背景下,始终存在着生活、文化、教育、人情与希望交织而成的“间色”,这种“间色”不耀眼,却始终存在;不喧闹,却蕴藏着韧性。(作者系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教授)

珍档重光 丹心永存——读《古承铎烈士日记(1941—1944)校注》

实、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被誉为“人民的歌手”。1948年5月,古承铎不幸被捕,关押于渣滓洞监狱,次年11月27日殉难于歌乐山松林坡。目前,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藏古承铎烈士1941至1944年的日记手稿共8本、16万余字,内容丰富。《古承铎烈士日记(1941—1944)校注》一书对其进行整理考证,分为《生活的反映》(1941年)、《心痕》(1942年)、《雨后蜗牛》《在生命的讴歌里》(1943年)、《心的写照·爱吾》(1944年)4部分,并附年谱及人物索引。全书集学术性、可读性于一体,兼具史料价值、思想价值,立体展现了古承铎烈士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成长、精神淬炼过程。如,书中详细记录了古承铎的日常生活、人际交往,尤其是清晰勾勒出他在贾唯英、周应培、马百平等人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从阅读进步书刊到参与社会活动,再到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工作……日日记

录的细节,是理解他如何在时代洪流中走向革命之路的关键线索。书中还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了古承铎在阅读中完善自我、完成思想蜕变的过程。在私立南川协和女子中学,古承铎研读张其昀的书,领悟到“文学是现实和

跋涉。书中更是生动展现了古承铎作为进步青年的精神世界和优秀品质。一是心系家国,志存高远。长沙大捷后,他难掩“热情与欢乐在我心灵里交织着”的激动;目睹日寇暴行和国统区现状,他指出“物价无限制的上涨……社会的暗影在恶劣底伸长”,发誓“向我们所痛恨的强暴、奸商、污吏、撕杀啊”。二是追求真理,勇于反思。他始终追寻真理,听马寅初讲“经济与哲学”后深感“自己太渺小”,激起对广阔知识世界的向往;他反复在日记中自省,决心“不做情感的奴隶”,认为“内心的空虚要以努力来填补”“忠实于自己的生活,就是忠实于自己的理想”。三是不畏艰难,矢志奋进。他出身贫寒、饱尝艰辛,却在日记中自勉:“贫何足忧,可忧者是贫而无志。”他严格要求自己,常因“生活堕落,就是一切罪恶的起点”,而自责,并告诫自己,“择定了一条路,努力地走去,纵然是在途中发现了阻碍,也千万别畏缩。”

四是关怀亲友,真诚待人。他对家人充满深情,常借日记表达对母亲和妹妹的思念、关怀;他关爱学生,也感念师恩,对马百平的教诲铭记于心;他关心友人,为病中的朋友忧心忡忡,称“痛苦了他的肉体,更痛苦了我们的精神”,也因友人之母去世而“倾囊相助”。这些品质,并非空洞的概念,而是从字里行间的日常生活、阅读思考中流淌出来的,日记承载的丰富内容,不仅让英烈形象鲜活饱满,也让英烈身上的理想光芒更加耀眼、坚毅品格更加动人。珍档重光,丹心永存。革命文物承载着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加强革命文物活化利用、革命史料整理研究,对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意义重大。《古承铎烈士日记(1941—1944)校注》一书,可以让广大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在阅读中与英烈展开跨时空对话,进而走进英烈人生,感悟英烈精神,汲取矢志奋斗的不懈动力。(作者王进系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协同研究部部长、研究馆员,杨智雄系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协同研究部馆员)

近悦远来
书香重庆



电子书
有声书
扫码即可
阅读、收听